

论汉语合音现象的研究

孙红举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 400715;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合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的音变现象。汉语的合音现象比较普遍,合音研究对考察汉语历史音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打通语言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化的研究,考察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互动共变关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价值。未来的研究从内容上要深化对合音现象的解释,从方法上要增强多种研究范式的综合运用。儿化韵、子变韵、D变韵、小称音变等都是合音,合音的多样类型有待深层生成机制的统一解释。合音与词汇、语法关系密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语言的结构。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应遵循语义关联、时间先后、语音照应、语料佐证等原则。合音的形成受“一音一义”律的推动,并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汉语音变现象多数体现了语音形式与语义之间的互动共变。

关键词:合音;音变;生成机制;界定原则;一音一义;语音层次

中图分类号:H1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15-10

合音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连并用的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有些学者又称并音、减音、音节缩减、音节连并、音节合并等。合音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音变现象,汉语中自古至今都存在。如古代汉语中的“诸_{之于/之乎}、叵_{不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甬_{不用}、您_{你们}”、重庆话中的“哪_{哪样}(个)、恁_{那么}(个)”,网络流行语中的“表_{不要}、酱_{这样}(紫)”等都是合音词,汉语方言中的儿化韵、子变韵、D变韵、小称音变等现象也多是由合音而形成的。

合音既可以表示音变过程,也可以表示音变结果。为称述方便,本文将合音结果从语音上称为合音音节,从语词功能上称为合音词,促成合音的几个音节称为合音成分,前合音成分为合音前字,后合音成分为合音后字,无字可写的合音词以同音字替代。前人已对儿化、子变韵、D变韵、小称音变等做过大量研究,本文主要以合音的特殊类型即“‘不用’合音为甬”类的合音词为核心,论述与合音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研究概况及研究趋势

合音的相关论述可以追溯到传统语言学时期,散见于对文献中“合音词”的注释。汉代郑玄笺《诗经·唐风·采苓》“舍旃舍旃”时已注意到“旃”为“之焉”。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提到“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在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合声”这种音变现象。进入20世纪,合音作为一种构词法得到确认,在金兆梓^[1]、刘复^[2]等人的构词法体系里,合音都有一席之地。新时期以来,系统地专门研究合音的文章开始出现,此后成为音变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内容有:(1)对单点方言合音现象的描写和揭示,积累了丰

* 收稿日期:2013-05-06

作者简介:孙红举,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重庆荣昌客家方言文化的调查、保存和传承研究”(2013YBWX084),项目负责人:孙红举;西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重庆荣昌县客家方言岛研究”(SWU1309396),项目负责人:孙红举;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方言合音现象研究”(11YJC740091),项目负责人:孙红举。

富的合音材料,这是目前研究得最多的,涉及的方言点有陕西子长、湖北大冶、江苏泗阳、浙江宁波和萧山、河北辛集和曲阳、福建蒲仙和古田、山西万荣和天镇、四川彭州和宜宾以及河南南阳、新乡、郑县、滑县和荥阳(广武)等,基本覆盖了汉语各方言区;(2)对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音节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合音音节语音构成模式的考察,研究合音音节如何通过合音成分音节的语音构成要素而生成;(3)对合音音节生成机制的研究,主要利用西方生成音系学的自主音段理论、优选论等探讨由合音成分音节生成合音音节的具有普遍性的深层机制,台湾语言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大陆相对较少;(4)利用合音的理念来分析和解决汉语史及汉语方言中的疑难问题,如江蓝生对“别”的来源的考察^[3]、叶祖贵对河南固始方言表处置义的“V头”中“头”的来源的分析^[4]等。

合音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现有研究多是对合音语料的分类与描述,解释较少。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视野下对合音现象的描写,还是生成语言学视野下对合音生成机制的考察,都还只是共时研究,是建立在语言系统同质论基础上的,而语言系统同质论的实质是“将语言系统视为语言单位之间构成的完全静态的结构,从而为语言分析的形式化、精密化奠定理论基础”,这种“共时研究难以解决语言生成演化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而且“强调静态性甚至静态性绝对化不可避免地会排斥变异、不对称、不平衡、无序等所谓‘噪音’,这违背了科学研究应与现实世界具有同构性的原则”^[5],容易导致对音变的中间过程认识不清,忽视语言作为复杂系统变化时的多条件性、偶发性等。

目前,合音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在研究内容上,越来越多地关注对纷繁复杂的合音现象背后统一的生成机制的概括和阐释,关注对合音与语音、词汇、语法发展变化之间关系的探索,重视对合音这种语言变异现象与改进语言结构的价值及其发挥作用途径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个固定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能够解释各种语言现象”^[6],只有进行系统的而非原子的观察,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且,人们对合音的成因、方式以及生成机制等问题的复杂性也有所认识,越来越多地研究采用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多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将语言作为一个非自足的系统来考察。研究语言开始把语言与社会、共时和历时、空间和时间、系统和变异等联系起来,语言研究方法论出现了转折和更新,人们对现象和事实的解释更加深入,跟合音有关的理论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合音的类型和范围

合音的类型可从合音成分的构成和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的语音对应关系两个角度考察。

一是合音的成分构成类型。根据合音成分的性质,合音可分为实语素同实语素相合、实语素同虚语素相合、虚语素同虚语素相合、虚语素同实语素相合等四大类,每种类型又可根据合音成分的具体情况分出多种小类。这种分类能够观察到合音与词语功能类别之间的联系以及合音在词汇中的大致分布情况,了解合音的倾向性。从已揭示的合音材料来看,有些类别在汉语方言中分布较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个别合音现象较为独特,体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具有类型学的重要价值。实语素与实语素合音的系统性较差,在词汇中的分布较为零散,词例较少,一般可以尽举,主要类别有:数词和量词(一个、几个)、代词和量词(兀块、这个)、代词和方位词(这哒、这傍)、动词和宾语(做啥、弄啥)、双音节趋向动词(起来、出去)、双音节方位词(顶上、底下)、双音节连词(只要、只有)、复合数词(二十、三十)、形容词叠音后缀及重叠形容词([呆]呵呵、[热热]闹儿闹儿)等;实语素与虚语素的合音系统性较强,合音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合音词的数量也往往较多,如儿化、子变韵、动词变韵、小称音变、代词和词缀(我侬、你们)、代词和结构助词(我的、你的)、称谓和语气词([哥]哥欸、[哥]哥啊)等;虚语素与虚语素合音的类别较少,常见的有:语气词和语气词(了呀、了欧)、助词和语气词(的欧、的奥);虚语素与实语素合音的情况,前后字之间多为介宾关系,如宁波的“搭我_{给我}和我、搭渠_{给他}、同他、拨我_{被我}、拨渠_{让他}”等^[7]。

二是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类型。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指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之间存在的语音对应关系,从共时平面看,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着多种类型。郑良伟^[8]和萧国政等^[9]分别从

台湾闽南语和汉语方言全局出发对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进行了全面描述,从合音音节的声韵调是否直接源自合音成分看,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类型有直选类合音和选变类合音两种。直选类合音音节的声韵调直接从合音成分音节中选取,主要类型有:①前声后韵后调式,如四川彭州^[10]“不要 po³³ iau¹³ > piau¹³”、河南鲁山“(弄)不好 pu⁵⁵ xau⁵⁵ > pau⁵⁵”;②前声后韵前调式,如河北辛集^[11]“四个 sɿ⁴ kə > sə⁴、十个 sɿ² kə > sə²”;③前声前介(介音)后韵前调(可能为变调)式,如河南鲁山“七个 ts‘i²⁴⁻⁴² kɿ⁰ > ts‘i⁴²、地下 ti³¹ ɕia³¹⁻⁰ > tia³¹”;④前声前介后韵后调式,如河南荥阳^[12]“起来 tɕ‘i⁵⁵ lai⁴² > tɕ‘ia⁴²”、湖北大冶陈贵^[13]“起来 tɕ‘i⁵³ la³¹ > tɕ‘ia³¹”。

选变类合音音节的声韵调构成并非直接从合音成分音节中选取,与合音成分的音节相比有变化,有单一成分变化(单变)和多种成分变化(多变)两种情况。单变式有:①变声式,如陕西神木^[14]“(男)子汉 tsəŋ²¹ xɛ²¹ > ts‘ɛ²¹”;②变韵式,如河南鲁山“不用 pu⁵⁵ yŋ³¹ > piŋ³¹”;③变调式,如山西万荣^[15]“怎么 tsɿ³³ mɿ²⁰ > tsɿ⁵¹”。多变式有:①声韵二变式,如山西神木^[14]“媳妇(子) ɕiəŋ⁴ fu⁴⁴ > sou⁴⁴”;②韵调二变式,如四川彭州^[10]“跟前 ken⁵⁵ tɕ‘ian²¹ > kan⁵²”;③声、调二变式,如厦门^[16]“唔用 m²¹ ioŋ²² > boŋ²⁴”;④声韵调全变式,如河南鲁山“做啥 tsou³¹ ʂa³¹ > tʂua⁴⁴²”。

仅仅从共时平面观察合音前后的语音变化,在理论和操作方法上存在一定欠缺:这种观察将合音完全当作现实平面上的一种音变现象,忽略了合音的历时性和渐变性。事实上,某些合音词的形成时间很早,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音节中的音类可能处于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上,而这正是出现合音模式的例外——选变类合音——的重要原因。如普通话中较早历史时期形成的合音词“廿”与合音成分“二十”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很松散。但另一方面,“选变类合音”现象的存在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扇观察语音历时变化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观察某些音类的历时发展轨迹。

“儿化韵”是“儿”音跟前一音节融合而形成的,方言中“儿”音的音值会影响到“儿化韵”的语音特点;形成子变韵、D变韵的后缀虽然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子变韵和D变韵都是后缀音节与词根音节融合所形成的;南方有些方言存在小称音变,这些小称音变如变韵、变调等大多也是由原来表小词缀的音节与词根音节融合而形成的。根据合音的实质和性质,儿化韵、子变韵、D变韵、小称音变等也属于合音的范畴,它们基本上都是由词根音节和词缀音节融合而成的。而“甬不用”、“(不)消需要”、“(多)咎早晚(晚)”等则多是由两个词根音节融合而成的,此类合音可称为狭义合音。目前,研究合音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狭义合音同其他类型的合音分开,大多只提狭义合音,而很少关涉其他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合音成分的构成、合音过程和合音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以至于人们对它们的心理认知有所不同而造成的。研究中,将狭义合音同这些特殊类型的合音现象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合音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探究合音同语音、词汇、语法发展演变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和规律的解释力更强,也具有更大范围的普适性。

三、合音音节的生成机制

对音变生成机制和音变过程的探讨是音变研究的重要内容,它的研究目标是用一种统一的理论和机制解释所有合音模式的共性,以及合音成分在什么条件下开始合音、合成什么样的音的问题,并以此预测合音行为的发展方向、判断合音结果的“合法”与否。

(一)EI 连结理论框架下合音的生成机制

钟荣富(Chung)^[17]采用 Yip^[18]自主音段音系学中的 EI 连结理论(Edge-in Association)来处理合音音节的生成过程,认为合音音节的生成受控于三个程序的顺次作用:汉语音节结构框架 CVX(C 代表声母,V 代表韵腹,X 代表韵尾,X 可以是元音或辅音)对合音成分及合音音节的约束;EI 连结时先连两端,再连内侧,即先连声母和韵尾,再连主要元音;扫描时由左至右先扫描[+syllabic]音段而后再扫描[-consonantal]音段作为元音。但对于元音和复元音的连结问题,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难以解答林修旭^[19]所提出的闽南语中“tsiaŋ(<tsit_脚 laŋ_脚)与 hong(<hɔ_让 laŋ_脚)的复元

音形成为何不一致;sun(<si_时 tsun_阵)的元音取舍原则何在”等问题。

萧宇超^[20]认为音节连并(合音)在音韵层面牵涉到声调与音段的连并、鼻音的连结与扩展以及音节的延长等内容。他改进了钟荣富的EI连结理论和分析方法,提出修订后的音节塑型来预测声调、音段成分和鼻音在合音中的变化,认为“X点支构架”不适用于解释音节外在的节奏,而建议使用Selkirk^[21]提出的韵拍机制。在句法层面,萧文认为相关音节的合音受制于彼此关系的亲疏,不同类型的句法结构会直接影响到音韵规则的运作,词汇性音节合音关乎音韵与构词之互动,短语性音节合音则必须受到句法表层结构的制约,他应用Kaisse^[22]的C统治参数与断点原则对音节连并的环境进行论述。Hui-Chuan Hsu^[23]认为元音的响度模型能够解释EI理论模型下合音中的诸多问题,对闽南语合音音节的生成也较有解释力,元音“a>ɔ>e>o>i>u”的响度次序决定了元音与合音音节韵腹的关联次序,一般情况下高响度的元音比低响度的元音优先组成音节。在EI理论模型下,合音音节声调的生成是一个删除相邻声调特征而保留非相邻特征的规则运转的过程,也遵循两侧连接的规则,如台湾闽南语中的“bin³³ + kan⁵⁵ > bian³⁵; tsun⁵⁵ + pi³³ > tsui⁵³”^[24]。而Chierh Cheng等^[25]研究后发现,在合音音节声调的生成过程中,底层声调总还是要浮现出来,而声调的融合程度受控于说话时的语速,声调表层形式的不同应该是发音上的差异,而非受规则的驱动。

(二)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合音的生成过程

王洪君在论述“‘二合一’式语音构词法”时,运用特征几何理论的特征树和最大音节模块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对不同地区的儿化韵和子变韵现象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儿化韵和子变韵的历史演化轨迹和过程,论述了儿化韵和子变韵的发生条件和生成音节的“合法性”等问题。王洪君认为合音中的词形模块经历了“两个正常音节>一个正常音节+轻声音节>一个长音音节>一个正常音节”的变化过程^[26],合音时,合音音节作为派生音节尽管可能突破单字音音节结构规则的限制,但音节的改变却始终要受到它的吸引和约束,合音音节最终会变得与单字音同模。张慧丽以河南方言中的儿化、子变韵、D变韵等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每种类型合音的语音格局、形成机制、彼此的作用机制和共同的制约条件等,进一步深入认识了这些类型合音的性质、特点和深层生成机制^[27]。

目前,关于合音生成机制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对象局限于儿化韵、子变韵和闽南语中的狭义合音现象等,分析时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和操作方法是否适用于更大范围内的各种合音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检验。另外,这些研究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同质说“只强调系统的封闭性、无时无空的静态性和其内部结构的平衡对称性,而忽视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和其内部结构方式的复杂性”^[28]。现实的语言是一个“动态的、适应自组织、非线性复杂系统,具有其他非线性复杂系统几乎所有的特性”^[5],从而导致各种理论模型下的生成机制总是有不少例外。未来对合音生成机制的研究需要介入系统复杂性视角,需考虑语言及其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考察语义、语法、语用因素以及系统环境因素对合音生成过程的影响,注意语言演变偶发性因素在合音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单一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已无法适应社会以及科学的发展”^[6]。

四、合音与词汇、语法和语用的关系

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组成的结构系统,某一层面结构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层面的连动变化,进而推动整个系统的发展。合音是几个音节挤进一个音节的框架而发生的音变,与词汇、语法紧密联系,是观察语音、词汇和语法互动共变关系的一个窗口。合音作为一种有序的语言变异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语言的结构。

(一)合音与语音系统

“语言的沿流是由说话的人无意识地选择的那些向某一方向堆积起来的个人变异构成的”^[29]。合音不是盲目的、随意的,它有一定的沿流(drift)和方向,具体表现在:其一,从音变前后的语音变化来看,合音采用的多是前声后韵的“反切”法;其二,合音在形成中尽管可能会暂时突破方言原有音节结构框架的限制,呈现出无序状态,但终究要受到汉语语音系统特点的制约,并要符合方言声

韵调搭配的基本音节结构格局,这样,经过逐步调整,还是会进入有序变异,回到音节的基本构架 CVX 中;其三,合音音节有可能填充方言语音系统中声韵调搭配的音节空格,这对改进方言的音系结构具有一定影响,如河南鲁山方言中由于“起来、没有、弄啥、底下/地下、顶上、两个、落花(生)”等的合音,出现了“tɕ‘iai、miou、nua、tia、tiaŋ、lia、lua”等音节;另一方面,合音音节一般不与语言中其他词同音,以免引起语义联想,避免了歧义的发生。

(二)合音与词汇创新及单音化

合音也是一种词汇现象,合音是词汇创新的一条途径,是一种造词的方法,任学良^[30]早有论述。合音前每个音节都联系一个意义,反之亦然,合音后几个音节融合为一个,且与一个较为概括的“整合”后的意义内容相联系,这样,通过改变意义和音节的关联方式,创造了新词。与其他一般词语相比,合音词在语音和语义的来源上有迹可循,理据性较强。合音词形成后,可以作为构词语素继续参与构词;另一方面,合音词也可能在与分说形式的使用竞争中发展出新的意义和用法,北方大多数地方“给我”的合音形式发展出祈使语气的用法即为如此。在合音造词的过程中,原来几个独立的音节融合为一个,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单音化现象,这与传统词汇理论中词汇双音化的发展模式形成一定对立。这一现象表明,词汇发展演变的模式并非单一,在双音节化的大趋势下,也存在单音节化的反向运动。有意思的是,有些合音形式在发展中会出现合音成分再次叠合在合音词上叠床架屋的情况,呈现出这两种模式的往复变化和双音节趋势的巨大类推力量,如卢县“只要>晏只要>只晏只要”^[31]、河南鲁山“(多)早晚>(多)咎早晚>(多)咎早晚”,江蓝生将这类词语称为语音羡余词^[32]。探讨合音造词在词汇孳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考察词汇单音节化和双音节化之间的关系、丰富词汇发展演变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合音与语法形式的创新

合音与语法紧密相关,合音所引起的语音结构的变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法结构。表达一定语法关系的合音成分序列之间边界逐渐模糊、转移或消失,能够改变句法结构的深层关系。合音是语法化在语音上的一种形式表征,是汉语语法化的一种模式。前后相连的成分,后字若在高频使用中词义逐渐磨损和虚化,语义的空灵和语法化会促使成分在发音上逐步轻化,并有可能进一步形成合音,成为语法化的终点,如汉语“啦了啊”、“呗吧款”等合音式语气词的形成,再如,烟台方言中某些虚语素的音段成分完全脱落,仅靠虚成分的声调合入前一音节所产生的变调而表示语法意义^[33]。

合音的形成也会推动语法化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语法形式,成为汉语语法形式创新的一条途径,如河南鲁山方言中分说形式“不用”表示劝诫语气,合音形式[pɪŋ]则发展为表命令语气的禁止词。某些合音形式在重新分析时,有可能导致新的语法手段的产生。连城(新泉)客家话“VPVP”式反复问句,从源头来看,是“VP 唔 VP”合音而形成的^[34]。闽南话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比单数形式多出一个 n 尾^{[35]268-269},表面上看使用的是特殊形态,实际上也是单数形式与复数词尾“依(农)”合音而造成的。若不清楚历时的合音情况,只从共时来看,上述两种形式会被重新分析为重叠和内部曲折。然而,如何看待这些由音变而形成的新的语法形式,语法形式的分析要不要考虑历时因素?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某些语言事实的定性,甚至关系到新的语法范畴的确立与否。无怪乎袁家骅^{[35]170-171}分析客家方言单数人称代词与领格形式对立和兰宾汉^[36]分析西安方言人称代词单复数与领属格的异同时,都认为是由词语内部曲折形成的。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已有形式的认识会逐渐模糊不清,通过重新分析,有可能形成新的语法范畴。合音这种有序的语音变异行为可以转化为结构上的屈折形态,这正是一种由个体行为而导致系统整体行为或新的结构、功能出现的语言发展中的“涌现”现象^[5]。

(四)合音与词语的高频使用

合音与语用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语用频率效应方面的研究显示,高频词比低频词更容易发生形式上的减缩^[37],因为词语的高频使用使得词语的生成和认知更加容易^[38]。合音由多个音节形式融合为一个音节,形式上发生减缩,一般也发生在较为随意的口语环境中,它的形成与词语的高频

使用同样密切相关。James Myers 和 Yingshing Li^[24] 从一个小型闽南语口语语料库中选出 120 个词语为研究对象,在对话料库中的词频和当地人对这些词语合音形式和分说形式主观估计的词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词频在合音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和实验分析。研究发现,合音中音段成分的缩减和声调的融合都与词频有关,词频高低与合音的程度呈现出梯度对等关系,而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则不大。由此,形成合音的大都是日常口语中高频出现的相连并用成分。另一方面,合音形成后,一般会与分说形式在表达功能、语体风格等方面形成一定的语用差异,丰富汉语的同义表达手段,人们可以根据说话时的情感态度、说话场景等自由选择合音或分说形式。

五、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

目前,还没有人对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提出有效的认定原则。个别学者在描写合音现象时过于随意,存在着把合音词同分音词相混和合音成分认定错误的情况。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认定不能仅凭感觉,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结论才经得起检验。

第一是语义关联原则。合音词与合音成分在语义上必须对应或能够形成语义演化的链条。这是认定合音词与合音成分的首要原则。如果合音词与合音成分在语义上没有关联,认定可能就有问题。事实上,大家在认定合音词与合音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基本上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第二是时间先后原则。这条原则主要是为了把合音词与分音词区别开来。分音指把一个音节拆开说成两个音节的现象,如晋语“摆>卜来、圈>曲联、茨>蒺藜”。合音与分音是汉语方言尤其是晋语及周边地区共存的两种不同音变现象。合音与分音前后的语义都能够严密对应,但合音是语音的聚变,是“急言”的结果;分音是语音的裂变,是“缓言”的结果,两者是相反的运动过程。二者的区分从时间顺序上说,先有合说形式后有分说形式的为分音词,先有分说形式后有合说形式的为合音词;从语素构成上看,合音词的源构成成分都是语素,而分音词则是一个语素。“摆、圈、茨”等词语早于“卜来、曲联、蒺藜”等,且后者都由一个语素构成,以此来看,“摆>卜来、圈>曲联、茨>蒺藜”都是分音的关系。

第三是语音照应原则。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的音节之间能够建立前后的语音对应关系。曾有多位学者认为“孛”是“不好”的合音。“孛”与“不好”语义相同,但它们在语音上却难以建立对应关系,因而合音的结论值得怀疑。在考察合音前后的语音对应关系时,必须考虑语音的历时演变,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的语音形式。在共时平面上,合音前后语音关系的不对应很有可能是语音历史演变造成的。普通话中“廿”与“二十”的语音对应关系只能在历时平面或方言中才能建立起来。再如,河南鲁山方言中“个”单念[kɿ],但“一个”的合音却为[yo],考察发现,合音形式形成的时间较早,单字音“个”的韵母在方言中发生了高化,单字音与合音形式中“个”的语音投影没有同步发展。

第四是文献或方言佐证原则。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在满足上述原则时,还要有历史文献资料或周边方言中的现实用例来补充证明。若缺少这一环节,判断有时也会失误。陕北子长话中的[ar⁴²]和“别人”语义相当,汪敬尧和杨美芬据此认为它是“别人”的合音,但其“语音形式的来源不清楚”^[39]。殊不知,根据语音和语义的对应原则,并参照周围其他方言中“别人”义的表达和使用情况,可以确定[ar⁴²]实为“人家”的合音,而非“别人”。

六、合音的成因与条件

(一)合音的成因——“一音一义”律的推动

清人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二》中提到“古人语急,则二字可缩为一字;语缓则一字可引为数字”。《小尔雅·广训》中释“诸”时说“诸,之乎也”,王引之注:“急言之曰‘诸’,徐言之曰‘之乎’。”这些论述指出了“合音”与语速的密切关系,认为合音是语速较快时的产物。对于合音的成因,现代学者多承袭了这一观点,几乎无人再有专门探讨。

“急说快读”可说是合音的直接促成因素,但将合音的成因处理为语速过快,却掩盖了音变的实

质,未免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相连的语段成分并非都会在快速连读情况下合音,合音对相连的语段成分往往有一定的选择性。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并不自足,在实际使用中,语言系统本身同使用语言的主体、外部环境等交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合音的成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而内因是根本原因。

徐通锵认为,结构格局是支配语言运转和演变的杠杆,汉语的音节是表义的语音单位,一个音节一个字,表达一个概念性的意义,使得汉语呈现出“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基础和基本结构格局,这是汉语最简单、最基本的结构原则^[40]。孙景涛在考察双声、叠韵等连绵词构造的基础上,将这种音义的关联进一步概括为“一音一义”律,即“汉语的语素在本质上是单音节的;一个语素义只能被一个音节表示,一个音节必定可以负载一个语素义”^[41]。音节与意义之间的强制关系使得汉语“音节”与“意义”之间互动制约,合音的形成与合音成分的概念化、词汇化密切关联,形成合音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一音一义”律。

相连并用的合音成分如“这一、出来、一个、底下、我的、兀块”等在方言中一般都是重轻式语音词,合音后字的语义在长期的相连并用中很容易磨损和虚化,而虚化的成分读音更轻,轻读的成分很容易发生脱落和音变^[42]。另一方面,合音后字语义的逐渐磨损和虚化也会促使合音成分在概念和意义上逐步整合,并最终整合为一个意义。这样,这些词语就呈现出“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与汉语基础性的结构格局相矛盾的状态,基本格局既然是支配语言运转和演变的杠杆,在汉语“一音一义”律的推动下,“1”的力量自然是最基本的,音义之间的互动最终还是将“2”纳入“1”的框架,合音成分的两个音节在经历了同化、脱落等音变过程后也逐渐融合为一个,甚至连字形也写成一个,从而形成“音”、“义”的对应^[40]。正如陈卫恒所言,合音实际上体现了汉语对单音节化即对“单”或“一”的追求,“根本精神就是让‘2’或‘多’个音节服从‘1个概念’的‘1’的要求,在语音上整合为一体”^{[43]171}。

(二)合音的条件——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等的多条件性

在现实语言中,“一音一义”律能否推动相连并用的语段成分向合音方向变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并非所有的并用成分都会产生合音。

语音条件。在合音成分内部,合音前后字多在一个自然音步之内,并且前后字在轻重音模式上多为前重后轻,后字在语流中多读轻声。合音对合音成分的音节结构特征没有必然要求,但发生合音的,后字音节本身或变化后常常较易融入前字音节。据初步观察,合音后字大多为(或在合音中经常变为)声化韵或声母为零声母、半元音或流音的音节。合音时语音具有强制性,合音可以跨越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而发生,如古汉语中“之于/之乎”合音为“诸”,神木“(男)子汉”合音为(男)[ts‘ε²¹]^[14],罗山“(V)死你”合音为“(V)sn”^[44]。

语义条件。在语义与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上,往往语义重则语音重,语义虚则语音轻。在合音成分内部,合音前字一般是表意的中心,后字所表示的意义往往相对空灵,语义上处于依附地位,属于辅助性的而非区别性的语义类别^{[43]87},因此,后字才有轻读并进一步与前字融合的可能。“数词+个”所构成的数量短语重在表“数”,“个”对区别后续事物名词的语义影响不大,且作为通用量词在理解时的可预测性较高,因此,大多数北方方言中“个”与“数词”都能合音,若换作其他量词如“斤、尺、碗”等,是不可能合音的。

语法条件。合音成分在句子中往往具有特定的语法位置和语法功能^{[43]87},它们往往处在句法的非核心位置、语义的辅助位置、补充信息或背景信息中。这种环境使得合音成分的语义虚化和功能虚化成为可能,为进一步的语音变异提供了句法和语义基础。如河南鲁山方言中“不好”只有处于动词“弄”后才合音为“(弄)[pau⁵⁵]”,表示“推测和可能”,而表示“好”的否定或处于其他句法位置时都不能合音。

语用条件。合音前后字必须经常相连并用,在较为随便的口语语体中使用频率较高。这样,前后字的组合在句子中的可预测性较高,具备快速连读的认知基础,合音成分的语义磨损和功能虚化

成为可能,促使合音成分逐步发生细微的语音变化。

上述只是发生合音的必要条件,并非具备了这些条件的语言成分就一定发生合音。合音作为一种语言变异现象,与语言系统的状况、合音的可能音节与语言中已有音节之间的语音和语义关系(如所形成的合音音节不会有语义联想)以及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知识水平等都有一定关系,而且合音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群体性和偶发性。因此,除了较为系统的与语法关系密切的“儿化、小称音变”等之外,很难准确预测合音行为的发生与否。

总之,相连并用成分是否合音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急说快读”直接促成因素,而汉语的“一音一义”律则是其根本推动力。合音的形成是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人”和语言系统内外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七、合音与其他音变的共性

语言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或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都会使语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语言是一个充满变体的集合在时间中的运动。”^[45]汉语的语音系统内部随时发生着各种变化,共时音变往往是历史音变的开始,音变是语音系统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如近代精组和见组在细音前面时腭化为舌面音声母。联系连读变调、轻声、同化、弱化等音变现象对合音进行研究,考察它们之间的共性,对于丰富音变理论、深化对音变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连读变调是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单字调在语流中失去本调而变读他调的情况,变调使原来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调类在特定的语音环境下变成调值相同的“虚化调”。如南部吴语汤溪方言中两字组连调中,前字读阴平、阳平、阴去时多变作[33]调,读阳去、阳上、阳入时多变作[11]调,读阴上、阳上则多变作[52]调^[46]。轻声是后字失去本调,变作由前字决定的没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虚调的音变,是连读变调的特殊形式。

同样,同化、弱化和脱落等音变现象都是语流中表达实词义较弱的音段特征的转移或失去的一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本来具有别义作用的语音符号要素在其他条件的补偿作用下变得趋同。根据前述,合音是相连成分由于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而产生的音节形式的融合,是“一音一义”律推动下对合音成分音节形式进行减缩,从而使语音区别性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

可以看出,汉语所有的音变现象,包括合音在内,实质上都是语流中相邻音节语音特征相互协调,将在单字音中具有别义作用而在语流中表义时冗余的语音特征删除或变为“中性形式”的一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语音从有标记形式转为无标记形式,体现的都是一种在“合”的精神下的变化,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的推动效用。因此,从根本上看,包括合音在内的汉语音变现象体现了口语中语词语音形式的简化运动,体现了语音形式对意义的协调变化,反映了语词口语形式与书面语形式之间的参差。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汉语词汇演变中的双音化和单音化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八、合音研究的价值

(一)对考察历史音韵的作用

合音研究表面看来是一种共时研究,实际上,合音现象中包含着时间的深度,对考察历史音韵具有重要作用,这有两层意义。

其一,合音形式本身可能显示不同的语音层次。分析语音历史层次主要依据的是文白异读,白读形式不仅存在于特别土的词语中,也可能存在于历史上曾经发生并已经完成的音变形式中。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现象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生的,音变完成时的语音形式如果没有随着语音演变的洪流继续前行,就会成为一种滞古现象,在其中以特殊形式存在着白读音。语言中,某些合音现象完成的时间较早,音节形式中残存着能够体现较早时期语音特点的白读音类是较为常见的事情,这些残存的白读音类成为除词语文白异读外观察语音历史层次和某些音类历史音值的又一重要窗口。合音前后语音形式在共时平面上对应不起来的例外现象(即前述的选变类合音)很多都

是由于合音音节的“滞古性”而造成的,而这正是对考察历史音韵极有价值的材料。河南鲁山话从一到十与“个”的连读音分别为:一个[yo]、两个[liə]、三个[sə]、四个[sɿʃ]、五个[u·uo]、六个[liou·uo]、七个[ts'ix]、八个[pə];九个[tɕiou·uo]、十个[ʃɿʃ]。从这些读音可以看出,“个”的韵母至少有三个层次,相应地存在着三个时间层的合音:韵母主要元音为白读音[a]的中古合音层、韵母主要元音为白读音[uo]的中古后合音层、韵母主要元音为文读音[ɿ]的现代合音层。

其二,区域范围内相同成分合音形式的差异可以揭示某些音类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方言地理学认为,某一区域内方言语音形式的地域差异可以反映其历史发展变化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通过揭示区域内某个条目或某一类型合音的形式差异,来考察合音的历时过程或某个音类的历时发展轨迹。关中方言“人家”的合音有[nia]、[niɛ]、[ɿɛ]、[ɿ̄ɛ]、[ɿ̄a]等多种形式^[31],浚县则合为[iæ⁴²]^[47],联系汉语历史音韵和南方方言中日母的读音情况,基本可以确定日母在关中地区也曾有读鼻音的层次,合音音节的声母读鼻音的形成时间较早,读舌音的靠后,读零声母则是在舌音声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合音音节的韵母差异中,可以发现“家”的韵母在发展中出现了高化现象。其次,某些词语的合音形式可以为某些历史音韵问题提供一定的证据。汉语历史音韵学认为,在近代,精组字在细音前面时腭化为舌面音,神木方言万镇话和贺家川话“媳妇(子)”都可以合音,分说形式中“媳”都读团音,但合音音节贺家川话读团音,而万镇话却读尖音^[14],其间的差异正好可以证明这一历史音韵变化。另外,合音研究“为汉语字、词典注音,辨识汉语古文献音释,或是为学习汉语音韵”,也具有积极意义^[48]。

(二)方法论价值

语言本质上是一个流动着的充满变化的系统,合音是音节层面的语言变异现象,是一种与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密切关系的语言创新活动。语言中的变异现象是沟通共时和历时的桥梁,对合音现象的研究是一种从共时语言变异中探索考察语言历时演变方式、过程以及趋向并从中总结语言历时演变规律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同时,合音研究也是描写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它“不仅关注语言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也研究语言形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文化解读,及对社会阶层和社会认同方式的影响,还包括这些解读对语音变化的影响”,这些研究与音变关系密切,比如 Woolard 从语用凸显成分提供了语音变化的动机^[49]。因此,研究中也需要这些学科多种研究方法的合力参与。

合音研究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考察汉语史和方言研究中某些词语的源流、考察某些音类的历时演变等问题,打通语言共时变异与历时变化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以合音为切入点考察合音与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互动共变关系,考察合音对语言结构的动态影响以及“异质有序”语言理论模型中语言从“结构——有序的变异——结构”的变化过程、条件和规律^{[50][51]},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汉语音变、词汇和语法理论,补正青年语法学派纯语音过程的音变理论的局限,加强语言变化和演变机制研究中的系统观和动态观,为语言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金兆梓. 国文法之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22.
- [2] 刘复. 中国文法通论[M]. 上海:群益书社,1920.
- [3] 江蓝生. 禁止词“别”考源[M]//近代汉语探源.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4] 叶祖贵. 河南固始方言表处置义的“V头”及“头”的合音来源[J]. 中国语文,2009(5):451-453.
- [5] 成军,莫启扬. 语言学研究的复杂性探索:语言结构生成、演化的动力学机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58-163.
- [6] 黄春芳. 论现代语言学的变迁: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70-175.
- [7] 徐波. 宁波方言中的合音词[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4):46-50.
- [8] Cheng, Robert. L. (郑良伟). Sub-syllabic Morphemes in Taiwanese[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5,13(1):12-43.
- [9] 萧国政,柯航,彭淑莉. 汉语合音词的语音构成类型及语义语法问题[C]//戴昭铭.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集.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335-345.

- [10] 杨绍林. 四川彭州方言的合音词[J]. 方言, 2007(3): 282-286.
- [11] 孔祥卿. 河北辛集话的合音现象与合音词——兼谈普通话合音词“俩”“仨”“别”的来源[J]. 南开语言, 2005(1): 110-116.
- [12] 王森. 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J]. 语言研究, 1994(1): 160-165.
- [13] 罗建军. 大冶陈贵方言口语中的合音词[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78-81.
- [14] 邢向东. 神木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63-164.
- [15] 吴静. 万荣方言的合音词[J]. 语文研究, 1995(2): 44-45.
- [16] 徐睿渊. 福建厦门方言的合音[J]. 方言, 2013(4): 332-339.
- [17] Chung R. (钟荣富). Syllable Contraction in Chinese[G]//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 第3辑. 台北: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1997: 199-235.
- [18] Yip, Moria. Template Morphology and the Directionality of Association[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988(6): 551-577.
- [19] 林修旭. 音节的缩减? 缩减的音节? [C]//第二届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会前论文集.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1995: 467-487.
- [20] 萧宇超. 从台语音节连并到音韵、构词与句法的关系: 老问题、新角度[G]//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 第5辑. 台北: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1999: 251-288.
- [21] Selkirk E. Phonology and Syntax: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Structur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 I. T. Press, 1984.
- [22] Kaisse E. Connected Speech: The Interaction of Syntax and Phonology[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5.
- [23] Hsu, Hui-chuan(许慧娟). A Sonority Model of syllable Contrac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3, 12(4): 349-377.
- [24] James Myers, Ying-shing Li. Lexical frequency effect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syllable contraction[J]. Journal of Phonetics, 2009, 37(2): 212-230.
- [25] Chierh Cheng, Yi Xu, Michele Gubia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Tonal Contraction in Taiwan Mandarin[C]//Proceedings of Interspeech 2010. Makuhari, Chiba, Japan, 2010: 2010-2013.
- [26] 王洪君.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增订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00-221.
- [27] 张慧丽. 汉语方言变韵的语音格局[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28] 徐通锵.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J]. 中国语文, 1990(1): 1-13.
- [29] (美)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陆卓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38.
- [30]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31] 孙立新. 关中方言“人家”的合音及其用法[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3): 56-62.
- [32] 江蓝生. 说语音羡余词[G]//中国语言学集刊: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71-186.
- [33] 张占山, 李如龙. 虚化的终极: 合音——以烟台方言若干虚成分合音为例[J].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95-100.
- [34] 项梦冰. 连城(新泉)话的反复问句[J]. 方言, 1990(2): 126-134.
- [35]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 第2版[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 [36] 兰宾汉. 西安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37] Fidelholtz J L. Word Frequency and Vowel Reduction in English[J].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75(11): 200-213.
- [38] Bybee J. Word Frequency and Context of Use in the Lexical Diffusion of Phonetically Conditioned Sound Change[J].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2002(14): 261-90.
- [39] 汪敬尧, 杨美芬. 晋语子长话的分音词、合音词、逆序词[J]. 榆林学院学报, 2003(4): 101-105.
- [40] 徐通锵. 音节的音义关联和汉语的变音[J]. 语文研究, 2003(3): 1-8.
- [41] 孙景涛. 论“一音一义”[G]//语言学论丛: 第31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48-71.
- [42] 江蓝生.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M]//近代汉语探源.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57-167.
- [43] 陈卫恒. 音节与意义暨音系与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的关联: 豫北方言变音的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 [44] 王东. 河南罗山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1.
- [45] 朱晓农. 寸照. 拉斯著《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述评[J]. 语言科学, 2007(5): 102-112.
- [46] 曹志耘. 南部吴语语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35-158.
- [47] 郑献琴. 浚县方言的人称代词[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3): 127-131.
- [48] 黎新第. 古反切韵母今读的简捷方法再探[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 117-125.
- [49] 张荣建. 社会语言学的整合发展趋势[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71-75.
- [50] 徐通锵. 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上)[J]. 语文研究, 1987(4): 1-9.
- [51] 徐通锵. 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下)[J]. 语文研究, 1988(1): 27-3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Lu Xu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hinese people's establishment of beliefs throughout his life. In Tokyo, Lu Xun described the figure of his "intellectual fighter" and researched the problems of religion. About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Chinese people establish their beliefs, Lu Xun had three ideas: liberty, honesty, and the power of doing. Lu Xun created some figures of real believer who had great suffering, great sorrow and great loneliness in his work. Lu Xun's contribution surpassed the limits of his tim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Aesthetic Category of Taige Style: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HE Zong-mei(96)

The beauty of 'Chongrong' lies in two of its distinct aesthetic features: namely, its phonology, which emphasizes strength, clarity, and vigor; and its morpholog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graceful, poised, and harmonious nature. The beauty of 'Chongrong' as exhibited in the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Catalogue for short)*" refers to the latter feature—the graceful morphology rather than the bold phonology. The "Fukuo" phenomeno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epitomizes the Taige style of writing. There are generally two reasons for this. The first is that the writers who practiced Taige style appreciated literature with a political, pragmatic and utilitarian attitude. The second is that the Taige style of literature was normally produced for the sake of courtly social intercourse or courtesy, and seldom for pure literary purposes. The aestheticists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not fond of the "Tanhuan" style. This was largely due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propagated by the Ming Empire. Later on this aesthetic inclination was adopted by the editors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in their critical reviews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views of the editors were generally biased, which should always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rom Macro-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o Micro-political Generalization:**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Two Stages of Western Marxist Cultural Criticism** LI Ying-zhi(107)

Cultural study as an academic trend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Marxist critique of ideology. At its earliest stage, it embodied the attributes of macro-politic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class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hegemony in social struggle. Since the start of French Marxism, however, later cultural criticism was concerned with the micro-politics in almost all the fields of culture. Although it also insisted on the spirit of ideological criticism at the earlier stage, it became the hindr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resistant forces for laying stress on anti-essentialism and no-subjectivity, which led cultural criticism to th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utopia.

On the Research of Syllable Contraction in Chinese

SUN Hong-ju(115)

Syllable contraction (SC) is a sandhi by which two or more syllables merger into one syllable. The research on SC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methodology in the sense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a bridge betwee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tudy in linguistics, inspec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co-variation between speech sounds, semantics and grammar. The future study is to deepen the explanation of SC in content, strengthen the synthetic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instruments. Er(儿) suffixation, Zi(子) suffixation, D suffixation and sandhi of diminutives are different kinds of SC. The various types of SC need to be a unified explanation in generative formalism. It ha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SC and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C can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 certain degree. Four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in determining the SC, including: semantic association, time-series,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and corpus evidence.